

忆往追思陈舜瑶

○唐绍明（1952届经济）

—

这是60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在清华校刊《新清华》工作。在一次对常迥教授的采访时，听他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。1936年他考入清华，开学时举行新生入学典礼，各人按座位排名依次就座。坐定后，他发现一边坐着个男生，一边坐着个女生，再看座位名字，男生叫陈丽娟（电机系，后改名陈力为，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），女生叫陈舜瑶（土木系）。他心中一直嘀咕：“你们坐错了，怎不换过来？”是的，看到舜瑶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“尧舜”，这怎会是个女生呢？况且读工科的男生多，哪儿来了个“工科女”呢？这就难免让人产生疑窦。这正是陈舜瑶同志刚入清华时的写照。

这一点不奇怪。她说，自小好学，有志报国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最反对孔子说的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。那时北京师大附中有男校和女校之分，她在女校学习。但男校比女校强，当男校开始破例招收女生时，她第一批转入男校，一心准备升学考清华。这时华北危机，国难深重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，她积极参与。但她后来回忆说，比起那些男同学的英勇斗争，自己怕影响投考清华而未能全身心投入运动，不免惭愧。在清华念了一年，实际上一半时间用于学习，一半参加了学生运动。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她随校南迁到了长沙。面对日寇紧逼，全民奋起抗战，



陈舜瑶学长在清华

她再也按捺不住了，就在南京失守的第二天，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在一位党员的介绍下，秘密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嗣后，和宋平同志一道奔赴山西前线参加抗战，又辗转到了延安，从此开启她革命战斗的征程。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可能与常迥、陈力为大师并肩的优秀工程师或建筑师，却多了一位为革命奉献终身的忠贞的战士——“旧社会的掘墓人”。

二

我和舜瑶同志的相识，始于1957年10月我从清华政治理论课调到校刊《新清华》工作。当年她是学校党委副书记兼校长助理，直接领导《新清华》，历时三载。她留给我们的印象可用二字来形容：“严格”。她要求我们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准确传达校党委的精神，还不时给予宣传指示，审阅每一期清样，后来还让我常年列席校党委常委会，便于直接领会

党委意图，了解全局情况。她工作起来十分勤奋，有几次晚上十点过后我去她家送清样，见她仍然伏案工作，桌边放着两片馒头。那时《新清华》一周出2~3期，任务重，工作紧张，为赶新闻时效，遇问题须随时向她请示，而每次都能得到明确的答复。由于工作开展顺利，大家心情舒畅，积极性充分发挥，刊物越办越有劲。我们曾多次应邀参加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，介绍经验。这一切都和她的领导分不开。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同志就曾对我说：“舜瑶嘛，她有经验，办过报。”我深切感到，如此三年多的新闻锻炼，对我日后从事思想工作帮助极大。

1961年她的工作有了变动，随宋平同志调往位于西安的中央西北局，任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。经她提出，组织批准，哲学教研组的黄寅宾同志和我也奉调随去，分别安排在宣传部的高教处和理论处工作。那时，西北局宣传部正部长缺位，部里全部工作由她和朱语今两位副部长领导，她主持常务，朱语今分管理论等处。三年后，我们工作又有了变动，黄寅宾调往延安，任县委书记；我则调去西北局研究室，参与组建学习组，从此离开了宣传部，离开了她的工作领导，但是，同志的情谊并没有就此疏离。

三

舜瑶同志和语今同志是抗战时期中央南方局的老战友，并肩战斗多年后分别，现在又走到一起来了，工作上相互支持，合作无间。工余之暇，我们常听他们满怀激情地回忆南方局的革命往事。那时舜瑶同志在南方局宣传部、统战委员会文化组工作，结识刘白羽、夏衍、巴金、老舍

等许多在后方的文化名人。此前，在延安时，她曾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一段。起因是周总理在延安骑马受伤，右手腕不能活动，组织上派她去帮助总理抄录文稿，记录总理的口授机宜。能够在总理身边工作，亲聆总理的教诲，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幸福的事，闻者无不欣羡，可她却未以此自诩，而以平常心待之。当她听有传闻她是总理的秘书时，总会平静地说：“不，我不是秘书，是书记员。”

中央南方局驻地在国民党的心窝重庆，是被国民党军警、特务重重包围的孤岛。1941年1月17日这一晚，注定是一个难忘之夜。国民党反动派发动“皖南事变”，七千余战友受到凶残、奸狡的袭击，或身陷囹圄，或血染茂林，被俘的遭到惨绝人寰的蹂躏，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。当晚，周恩来同志召集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全体同志开会，沉痛地讲述了“皖南事变”经过、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，要大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，准备国民党当局对我南方局机关进行袭击，攫取党的机密——密码、文件、地下党员名单等。要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抵挡几分钟，毁掉党的机密；只要党的机密能保住，要捕、要关、要杀就随他们了。他教我们：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，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，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，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；问你们党组织情况，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，主席是毛泽东，这里有支部，书记是周恩来；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，就说有董必武、邓颖超；要再问，就说不知道，让他们来问周恩来！我们要准备牺牲，甚至全体牺牲！大家屏息静听，悲愤难平，完全明白此时自己所处的险境，牢记党员在生死关头坚

□ 怀念师友

守立场的誓言。外面夜黑雾重，春寒彻骨。室内悲壮激烈，义愤填膺，真仿佛“易水萧萧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，正壮士悲歌未彻”，但，这不是悲伤的告别，是打退国民党当局猖狂进攻的临战誓师。她说，这是刻骨铭心的一夜！我是学生出身的青年，虽然见过大刀水龙，但面临这样严酷的阶级斗争大世面还是第一次，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教育课！

她对我说，这时我们的党，已不是当年“四一二”、“马日事变”时的党，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磨砺，已经成熟。在我们心中，有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，有自己的军队，有自己的根据地，又有广大人民的防卫，再加上当下有周恩来、叶剑英、董必武、邓颖超等久经考验的老同志的坚强领导，有钱瑛等老同志英勇奋斗的榜样，大家信心倍增，不管前面有多大艰险，一定能够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。特别是周恩来同志那大义凛然的革命气概，舍己为人的道德风范，奇才睿智的斗争艺术，更坚定了同志们与反动派拼到底的决心！

朱语今同志是在南方局的青年组工作，组长刘光去世后，他代理组长，负责联系西南地区青年运动。他们经常接待进步青年来访，交谈思想，传阅进步书刊；西南联大学生李祖平（现名李光言、食品工业专家）等对此留有深刻的记忆。震惊中外的昆明“一二·一”学生运动爆发后，他们密切关注运动的进展，专门听取西南联大地下党负责同志的汇报，及时传达钱瑛同志的指示，指导“一二·一”学生运动最终取得光辉的胜利。他和南方局所有同志一样，深受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的感染，毕生崇敬。当听到周恩来逝世，

他含泪写下一首诗寄托哀思：“毕生奋战死方休，盛德丰功世寡俦。樽俎折冲凭舌剑，疆场驰骋仗吴钩。披肝沥胆无私虑，呕血焦心为国谋。身后犹遭奸贼忌，只缘遗爱在神州！”

他们的这些革命斗争经历，说起来惊心动魄，听起来刻骨铭心，使我们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舜瑶同志随中共代表团转战南京，继续在国统区战斗，直到解放战争打响，才调回东北解放区，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，最后担任东北团委副书记。朱语今也去了南京，往返于沪港之间，领导上海地区学生运动，负责联系西南地区地下党的工作，解放后任共青团中央常委、宣传部长。

四

走出校门，来到广袤的大西北，舜瑶同志要求我们面向农村、熟悉农村、向农民学习，补好“学农”这一课，还风趣地把这叫做“扫农盲”。她鼓励我到陕西渭南县委蹲点一年有余。

多年以后，她写了一本书《沙都散记》，1994年初送给我一本。该书记述上世纪50至80年代，一群科学工作者在我国西北沙漠地区防沙治沙的感人事迹。当时为修建通向西北的大动脉——包兰铁路，须先解决防止沙丘移动危及铁路安全的问题，铁道部在宁夏中卫县沙坡头地区设立了一个治沙实验站，开展防治铁路沙害的研究工作，后发展为沙坡头地段铁路治沙防护体系，被称为“沙都”。30年来，中国科学院、铁道部、林业部的专家学者，一批又一批地从未间断地进驻这片荒凉地带，为防治铁路沙害付出了艰苦的劳动，终于集几代人的心血辛劳，集各行



《沙都散记》

专家学者的卓识，集工农技术人员的实践于一体，使铁路沙害这一令人生畏的难题，在理论上、实践上得到解决，为沙漠科学的研究、为治理沙漠的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书中有对他们工作、生活的记述，有对科学研究的探索，有文学笔调的抒发，有新闻报道的细腻，以及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启示。这是五代治沙先驱者为防治铁路沙害而艰难创业的一曲凯歌！也是对他们为中国沙漠科学领域开拓创新的一曲赞歌！书出版后编入《中国大西北》丛书（1990年，甘肃人民出版社），习仲勋同志特为丛书写了《前言》。

我读《沙都散记》，深受感动，不光是因为这书写得客观翔实、意境高远，更有感于舜瑶同志那牢记使命、勇于探索、不懈追求的革命精神。她不顾自身年高体弱，放下身段，深入沙坡头、榆林、奈曼等几处防沙基地考察了解，站在沙漠现场指导工作，与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座谈交流，仔细阅读有关论文和专著。回到北京后还一直惦记着沙区，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难题，最后还完成这样一部史诗般的全纪录。她本对知识分子十分熟悉，这次则是对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，对他们的学识、志向、毅力、困苦和情绪，详尽地予以报道，对他们不辱使

命、团结协作、忘我奉献、造福人民的伟大精神和卓越成就表示高度敬佩。

书写到最后，她情不自禁唱出一曲赞歌，可谓《柠条礼赞》：“呵！花棒、柠条、油藁、沙拐枣，你朴素无华，深藏不露，根底深厚，顽强坚韧；你索取最少，却奉献一切；你默默无闻，却欣然自得；你不羡慕长在名苑供人欣赏，却乐在天涯战风沙；你勇作先锋，功成身退，鞠躬尽瘁，死而不已，留得残骸犹固沙；你是治沙人的好伴侣，是他们的知己，是他们的宠爱，也是他们的象征！……朋友，不要说荒漠里只有风沙没有花，请摘一束花棒，捧一把柠条，献给去世的、健在的、志愿献身于斗风沙的人们吧！”她热情讴歌生活中的真善美，讴歌平凡中的伟大，讴歌群众中的英雄，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国家脊梁，充分表现了她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，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本色。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！

五

“文革”后，她先是去了甘肃省委宣传部，后调北京，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、顾问，做政策研究工作。80年代初，一些原西北局同志回到北京，和她见面机会多了。她虽已届高龄，但身体犹健，精神矍铄，回忆往事，感慨萦怀。

她回忆1953年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，她和蒋南翔同志一起奉调来清华大学工作，任校长助理、副教务长、校党委副书记，协助南翔同志探索新形势下办学的方向、教学的改革，1961年离开清华。在清华工作8年多，和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正如她后来回忆“清华缘”时所说：我爱清华，我爱清华人，清华的记忆像校

□ 怀念师友

花紫荆！回忆清华成了她晚年生活的一件快事，竟至不知老之已至。

她记得，进校之前，曾同南翔同志一起去东北工业基地参观考察，看工厂，看设备，和技术人员、清华毕业生座谈，探讨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？对工科大学办学有什么要求？在鞍钢，他们看到宣传表扬一位青年工程师林宗棠。经过了解，林是从西南联大入学、在清华毕业，受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训练，能和工人打成一片，生产上发挥重要作用，获得“劳动模范”称号。正是从林宗棠，以及这样一批先进工作者身上，他们看到清华毕业生应当具有的德才兼备的品格，从而产生“又红又专”的大学培养目标的设想，产生用自己的力量培养自己的专家学者的决心和信心。

她回忆清华搞“真刀真枪”毕业设计的改革，是教学工作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很好体现。把重点工厂、企业的先进设计任务拿到学校作为教学任务来做，学

时延长一年，却可以使学生得到全面的理论和实际的锻炼，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，这不是一般实际工作锻炼所能比拟的。为此要迈开脚步，开门办学，她每年都会拿出一定时间去联系有关省市领导、产业界同志，帮助找来合适的实习项目。每当看到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，很快适应环境，当上技术员、工程师、厂长、经理，在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，她由衷地感到欣慰。

她回忆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建立，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创举。从学生中选拔政治辅导员，既要思想好，还要学习好，做到“双肩挑”，成为学生中的表率。做思想政治工作须占用一部分学习时间，应予弥补学习不足，让他们推迟一年毕业。这关系到国家的用人计划，涉及国家计委、教育部、财政部和民政部等多个部门的协同，须经中央批准。为此她曾同南翔同志一道去向时任中宣部部长、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同志请示汇报。

她回忆说，刚到清华工作，头一次领工资，是按学校职员系列算的，工作人员对她说：“你这是清华职员里最高的了。”她才发现这和党政干部系列、学校教师系列的待遇相差甚大。由于长期受旧社会偏见的影响，学校职员，也就是行政人员，不仅工资低，社会地位也不高，积极性受到很大压抑。她及时向南翔同志做了反映。经过调查研究，他们认为，在大学里，强调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，不应忽视行政人员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，应予同样尊重。后来南翔同志提出教师



1992年校庆，陈舜瑶学长返校与刘达校长等校领导合影。左起：解沛基、陈舜瑶、方惠坚、刘达、李传信、胡健、刘冰

和职员是一辆车子的“两个轮子”的思想，并且加强了全校职工的工作，充分调动全校行政人员的积极性。“大跃进”中的“五马奔腾”——行政战线就有一份贡献。

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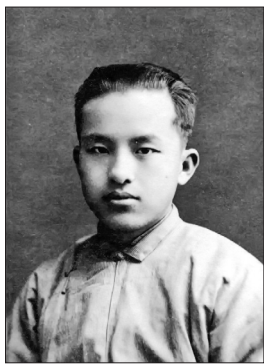
舜瑶曾是第一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，曾参与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讨论制定。她还多次作为国家高级代表团成员，出席国际会议。但她一向平和低调，不事张扬，不图名利，讲求实

干，默默奉献。她克己奉公，清廉自守，家教严明，风清气正。她平等待人，同志情深，尤为关爱年轻人，受到大家的敬重。

2019年7月31日，她走完了102年人生历程，乘鹤西去。回顾她那忠诚、正直、奉献的灿烂一生，堪称仁者福寿！我们和她的交往，虽然只是她漫长人生中的片段，却永远结下了诚挚的友谊，受到深厚的教诲，我们感谢她！我们怀念她！在我们心中，她始终是一位良师益友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！
2020年2月

我的父亲——杰出的化学家和教育家孙承谔

○孙捷先（1961届机械）



读书的孙承谔
一九二五年在清华学校

我父亲孙承谔诞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那年，逝世于1991年改革开放时期。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为动荡的年代。前半生，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，赴美留学，尽展才华，在化学研究上做出杰出贡献，在世界物理化学界崭露头角。回国后也为实现科学和教育救国的理想，艰苦奋斗，竭尽全力。后半生，他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和建设鞠躬尽瘁，虽经多次政治运

动的磨难，仍孜孜不倦地投身教学、科研和北大化学系的管理，辛勤耕耘，为人师表，桃李满天下。他以身作则，谦虚谨慎，关爱教职员工和学生，深受大家敬爱。

我家祖居山东济宁。清朝时，济宁孙氏家族三代人中出了多个举人、进士、榜眼、状元，出任封疆大吏或朝廷要职，官居一品。与曲阜孔家常为姻亲，家族文化水乳交融。民国时，家风依旧，重教修德。我祖父孙曾荫（1877—1957），字矩存，早年留学日本学法律，参加过同盟会，曾在山东省府任职。我奶奶孔令德（1875—1961）是孔夫子七十六代后裔。1923年孙承谔12岁时，便步哥哥孙承谟后尘，考上清华学校。

1929年，18岁的孙承谔从清华毕业后，公费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留学，两年后拿到学士学位。1933年他22岁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。次年被聘为普林斯顿

忆往追思陈舜瑶

○唐绍明（1952届经济）

—

这是60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在清华校刊《新清华》工作。在一次对常迥教授的采访时，听他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。1936年他考入清华，开学时举行新生入学典礼，各人按座位排名依次就座。坐定后，他发现一边坐着个男生，一边坐着个女生，再看座位名字，男生叫陈丽娟（电机系，后改名陈力为，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），女生叫陈舜瑶（土木系）。他心中一直嘀咕：“你们坐错了，怎不换过来？”是的，看到舜瑶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“尧舜”，这怎会是个女生呢？况且读工科的男生多，哪儿来了个“工科女”呢？这就难免让人产生疑窦。这正是陈舜瑶同志刚入清华时的写照。

这一点不奇怪。她说，自小好学，有志报国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最反对孔子说的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。那时北京师大附中有男校和女校之分，她在女校学习。但男校比女校强，当男校开始破例招收女生时，她第一批转入男校，一心准备升学考清华。这时华北危机，国难深重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，她积极参与。但她后来回忆说，比起那些男同学的英勇斗争，自己怕影响投考清华而未能全身心投入运动，不免惭愧。在清华念了一年，实际上一半时间用于学习，一半参加了学生运动。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她随校南迁到了长沙。面对日寇紧逼，全民奋起抗战，



陈舜瑶学长在清华

她再也按捺不住了，就在南京失守的第二天，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在一位党员的介绍下，秘密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嗣后，和宋平同志一道奔赴山西前线参加抗战，又辗转到了延安，从此开启她革命战斗的征程。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可能与常迥、陈力为大师并肩的优秀工程师或建筑师，却多了一位为革命奉献终身的忠贞的战士——“旧社会的掘墓人”。

二

我和舜瑶同志的相识，始于1957年10月我从清华政治理论课调到校刊《新清华》工作。当年她是学校党委副书记兼校长助理，直接领导《新清华》，历时三载。她留给我们的印象可用二字来形容：“严格”。她要求我们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准确传达校党委的精神，还不时给予宣传指示，审阅每一期清样，后来还让我常年列席校党委常委会，便于直接领会

党委意图，了解全局情况。她工作起来十分勤奋，有几次晚上十点过后我去她家送清样，见她仍然伏案工作，桌边放着两片馒头。那时《新清华》一周出2~3期，任务重，工作紧张，为赶新闻时效，遇问题须随时向她请示，而每次都能得到明确的答复。由于工作开展顺利，大家心情舒畅，积极性充分发挥，刊物越办越有劲。我们曾多次应邀参加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，介绍经验。这一切都和她的领导分不开。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同志就曾对我说：“舜瑶嘛，她有经验，办过报。”我深切感到，如此三年多的新闻锻炼，对我日后从事思想工作帮助极大。

1961年她的工作有了变动，随宋平同志调往位于西安的中央西北局，任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。经她提出，组织批准，哲学教研组的黄寅宾同志和我也奉调随去，分别安排在宣传部的高教处和理论处工作。那时，西北局宣传部正部长缺位，部里全部工作由她和朱语今两位副部长领导，她主持常务，朱语今分管理论等处。三年后，我们工作又有了变动，黄寅宾调往延安，任县委书记；我则调去西北局研究室，参与组建学习组，从此离开了宣传部，离开了她的工作领导，但是，同志的情谊并没有就此疏离。

三

舜瑶同志和语今同志是抗战时期中央南方局的老战友，并肩战斗多年后分别，现在又走到一起来了，工作上相互支持，合作无间。工余之暇，我们常听他们满怀激情地回忆南方局的革命往事。那时舜瑶同志在南方局宣传部、统战委员会文化组工作，结识刘白羽、夏衍、巴金、老舍

等许多在后方的文化名人。此前，在延安时，她曾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一段。起因是周总理在延安骑马受伤，右手腕不能活动，组织上派她去帮助总理抄录文稿，记录总理的口授机宜。能够在总理身边工作，亲聆总理的教诲，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幸福的事，闻者无不欣羡，可她却未以此自诩，而以平常心待之。当她听有传闻她是总理的秘书时，总会平静地说：“不，我不是秘书，是书记员。”

中央南方局驻地在国民党的心窝重庆，是被国民党军警、特务重重包围的孤岛。1941年1月17日这一晚，注定是一个难忘之夜。国民党反动派发动“皖南事变”，七千余战友受到凶残、奸狡的袭击，或身陷囹圄，或血染茂林，被俘的遭到惨绝人寰的蹂躏，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。当晚，周恩来同志召集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全体同志开会，沉痛地讲述了“皖南事变”经过、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，要大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，准备国民党当局对我南方局机关进行袭击，攫取党的机密——密码、文件、地下党员名单等。要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抵挡几分钟，毁掉党的机密；只要党的机密能保住，要捕、要关、要杀就随他们了。他教我们：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，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，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，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；问你们党组织情况，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，主席是毛泽东，这里有支部，书记是周恩来；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，就说有董必武、邓颖超；要再问，就说不知道，让他们来问周恩来！我们要准备牺牲，甚至全体牺牲！大家屏息静听，悲愤难平，完全明白此时自己所处的险境，牢记党员在生死关头坚

□ 怀念师友

守立场的誓言。外面夜黑雾重，春寒彻骨。室内悲壮激烈，义愤填膺，真仿佛“易水萧萧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，正壮士悲歌未彻”，但，这不是悲伤的告别，是打退国民党当局猖狂进攻的临战誓师。她说，这是刻骨铭心的一夜！我是学生出身的青年，虽然见过大刀水龙，但面临这样严酷的阶级斗争大世面还是第一次，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教育课！

她对我说，这时我们的党，已不是当年“四一二”、“马日事变”时的党，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磨砺，已经成熟。在我们心中，有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，有自己的军队，有自己的根据地，又有广大人民的防卫，再加上当下有周恩来、叶剑英、董必武、邓颖超等久经考验的老同志的坚强领导，有钱瑛等老同志英勇奋斗的榜样，大家信心倍增，不管前面有多大艰险，一定能够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。特别是周恩来同志那大义凛然的革命气概，舍己为人的道德风范，奇才睿智的斗争艺术，更坚定了同志们与反动派拼到底的决心！

朱语今同志是在南方局的青年组工作，组长刘光去世后，他代理组长，负责联系西南地区青年运动。他们经常接待进步青年来访，交谈思想，传阅进步书刊；西南联大学生李祖平（现名李光言、食品工业专家）等对此留有深刻的记忆。震惊中外的昆明“一二·一”学生运动爆发后，他们密切关注运动的进展，专门听取西南联大地下党负责同志的汇报，及时传达钱瑛同志的指示，指导“一二·一”学生运动最终取得光辉的胜利。他和南方局所有同志一样，深受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的感染，毕生崇敬。当听到周恩来逝世，

他含泪写下一首诗寄托哀思：“毕生奋战死方休，盛德丰功世寡俦。樽俎折冲凭舌剑，疆场驰骋仗吴钩。披肝沥胆无私虑，呕血焦心为国谋。身后犹遭奸贼忌，只缘遗爱在神州！”

他们的这些革命斗争经历，说起来惊心动魄，听起来刻骨铭心，使我们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舜瑶同志随中共代表团转战南京，继续在国统区战斗，直到解放战争打响，才调回东北解放区，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，最后担任东北团委副书记。朱语今也去了南京，往返于沪港之间，领导上海地区学生运动，负责联系西南地区地下党的工作，解放后任共青团中央常委、宣传部长。

四

走出校门，来到广袤的大西北，舜瑶同志要求我们面向农村、熟悉农村、向农民学习，补好“学农”这一课，还风趣地把这叫做“扫农盲”。她鼓励我到陕西渭南县委蹲点一年有余。

多年以后，她写了一本书《沙都散记》，1994年初送给我一本。该书记述上世纪50至80年代，一群科学工作者在我国西北沙漠地区防沙治沙的感人事迹。当时为修建通向西北的大动脉——包兰铁路，须先解决防止沙丘移动危及铁路安全的问题，铁道部在宁夏中卫县沙坡头地区设立了一个治沙实验站，开展防治铁路沙害的研究工作，后发展为沙坡头地段铁路治沙防护体系，被称为“沙都”。30年来，中国科学院、铁道部、林业部的专家学者，一批又一批地从未间断地进驻这片荒凉地带，为防治铁路沙害付出了艰苦的劳动，终于集几代人的心血辛劳，集各行



《沙都散记》

专家学者的卓识，集工农技术人员的实践于一体，使铁路沙害这一令人生畏的难题，在理论上、实践上得到解决，为沙漠科学的研究、为治理沙漠的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书中有对他们工作、生活的记述，有对科学研究的探索，有文学笔调的抒发，有新闻报道的细腻，以及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启示。这是五代治沙先驱者为防治铁路沙害而艰难创业的一曲凯歌！也是对他们为中国沙漠科学领域开拓创新的一曲赞歌！书出版后编入《中国大西北》丛书（1990年，甘肃人民出版社），习仲勋同志特为丛书写了《前言》。

我读《沙都散记》，深受感动，不光是因为这书写得客观翔实、意境高远，更有感于舜瑶同志那牢记使命、勇于探索、不懈追求的革命精神。她不顾自身年高体弱，放下身段，深入沙坡头、榆林、奈曼等几处防沙基地考察了解，站在沙漠现场指导工作，与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座谈交流，仔细阅读有关论文和专著。回到北京后还一直惦记着沙区，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难题，最后还完成这样一部史诗般的全纪录。她本对知识分子十分熟悉，这次则是对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，对他们的学识、志向、毅力、困苦和情绪，详尽地予以报道，对他们不辱使

命、团结协作、忘我奉献、造福人民的伟大精神和卓越成就表示高度敬佩。

书写到最后，她情不自禁唱出一曲赞歌，可谓《柠条礼赞》：“呵！花棒、柠条、油藁、沙拐枣，你朴素无华，深藏不露，根底深厚，顽强坚韧；你索取最少，却奉献一切；你默默无闻，却欣然自得；你不羡慕长在名苑供人欣赏，却乐在天涯战风沙；你勇作先锋，功成身退，鞠躬尽瘁，死而不已，留得残骸犹固沙；你是治沙人的好伴侣，是他们的知己，是他们的宠爱，也是他们的象征！……朋友，不要说荒漠里只有风沙没有花，请摘一束花棒，捧一把柠条，献给去世的、健在的、志愿献身于斗风沙的人们吧！”她热情讴歌生活中的真善美，讴歌平凡中的伟大，讴歌群众中的英雄，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国家脊梁，充分表现了她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，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本色。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！

五

“文革”后，她先是去了甘肃省委宣传部，后调北京，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、顾问，做政策研究工作。80年代初，一些原西北局同志回到北京，和她见面机会多了。她虽已届高龄，但身体犹健，精神矍铄，回忆往事，感慨萦怀。

她回忆1953年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，她和蒋南翔同志一起奉调来清华大学工作，任校长助理、副教务长、校党委副书记，协助南翔同志探索新形势下办学的方向、教学的改革，1961年离开清华。在清华工作8年多，和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正如她后来回忆“清华缘”时所说：我爱清华，我爱清华人，清华的记忆像校

□ 怀念师友

花紫荆！回忆清华成了她晚年生活的一件快事，竟至不知老之已至。

她记得，进校之前，曾同南翔同志一起去东北工业基地参观考察，看工厂，看设备，和技术人员、清华毕业生座谈，探讨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，需要什么样的人材？对工科大学办学有什么要求？在鞍钢，他们看到宣传表扬一位青年工程师林宗棠。经过了解，林是从西南联大入学、在清华毕业，受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训练，能和工人打成一片，生产上发挥重要作用，获得“劳动模范”称号。正是从林宗棠，以及这样一批先进工作者身上，他们看到清华毕业生应当具有的德才兼备的品格，从而产生“又红又专”的大学培养目标的设想，产生用自己的力量培养自己的专家学者的决心和信心。

她回忆清华搞“真刀真枪”毕业设计的改革，是教学工作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很好体现。把重点工厂、企业的先进设计任务拿到学校作为教学任务来做，学

时延长一年，却可以使学生得到全面的理论和实际的锻炼，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，这不是一般实际工作锻炼所能比拟的。为此要迈开脚步，开门办学，她每年都会拿出一定时间去联系有关省市领导、产业界同志，帮助找来合适的实习项目。每当看到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，很快适应环境，当上技术员、工程师、厂长、经理，在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，她由衷地感到欣慰。

她回忆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建立，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创举。从学生中选拔政治辅导员，既要思想好，还要学习好，做到“双肩挑”，成为学生中的表率。做思想政治工作须占用一部分学习时间，应予弥补学习不足，让他们推迟一年毕业。这关系到国家的用人计划，涉及国家计委、教育部、财政部和民政部等多个部门的协同，须经中央批准。为此她曾同南翔同志一道去向时任中宣部部长、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同志请示汇报。

她回忆说，刚到清华工作，头一次领工资，是按学校职员系列算的，工作人员对她说：“你这是清华职员里最高的了。”她才发现这和党政干部系列、学校教师系列的待遇相差甚大。由于长期受旧社会偏见的影响，学校职员，也就是行政人员，不仅工资低，社会地位也不高，积极性受到很大压抑。她及时向南翔同志做了反映。经过调查研究，他们认为，在大学里，强调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，不应忽视行政人员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，应予同样尊重。后来南翔同志提出教师



1992年校庆，陈舜瑶学长返校与刘达校长等校领导合影。左起：解沛基、陈舜瑶、方惠坚、刘达、李传信、胡健、刘冰

和职员是一辆车子的“两个轮子”的思想，并且加强了全校职工的工作，充分调动全校行政人员的积极性。“大跃进”中的“五马奔腾”——行政战线就有一份贡献。

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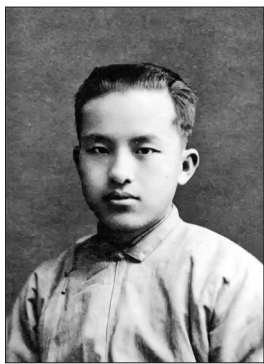
舜瑶曾是第一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，曾参与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讨论制定。她还多次作为国家高级代表团成员，出席国际会议。但她一向平和低调，不事张扬，不图名利，讲求实

干，默默奉献。她克己奉公，清廉自守，家教严明，风清气正。她平等待人，同志情深，尤为关爱年轻人，受到大家的敬重。

2019年7月31日，她走完了102年人生历程，乘鹤西去。回顾她那忠诚、正直、奉献的灿烂一生，堪称仁者福寿！我们和她的交往，虽然只是她漫长人生中的片段，却永远结下了诚挚的友谊，受到深厚的教诲，我们感谢她！我们怀念她！在我们心中，她始终是一位良师益友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！
2020年2月

我的父亲——杰出的化学家和教育家孙承谔

○孙捷先（1961届机械）



读书的孙承谔
一九二五年在清华学校

我父亲孙承谔诞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那年，逝世于1991年改革开放时期。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为动荡的年代。前半生，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，赴美留学，尽展才华，在化学研究上做出杰出贡献，在世界物理化学界崭露头角。回国后也为实现科学和教育救国的理想，艰苦奋斗，竭尽全力。后半生，他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和建设鞠躬尽瘁，虽经多次政治运

动的磨难，仍孜孜不倦地投身教学、科研和北大化学系的管理，辛勤耕耘，为人师表，桃李满天下。他以身作则，谦虚谨慎，关爱教职员工和学生，深受大家敬爱。

我家祖居山东济宁。清朝时，济宁孙氏家族三代人中出了多个举人、进士、榜眼、状元，出任封疆大吏或朝廷要职，官居一品。与曲阜孔家常为姻亲，家族文化水乳交融。民国时，家风依旧，重教修德。我祖父孙曾荫（1877—1957），字矩存，早年留学日本学法律，参加过同盟会，曾在山东省府任职。我奶奶孔令德（1875—1961）是孔夫子七十六代后裔。1923年孙承谔12岁时，便步哥哥孙承谟后尘，考上清华学校。

1929年，18岁的孙承谔从清华毕业后，公费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留学，两年后拿到学士学位。1933年他22岁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。次年被聘为普林斯顿